www.whb.cn
2022年9月1日 星期四 文匯報

上海之鱼

让“新江南文化”在追梦征途上绽放绚丽之花

大运河与中国特色文艺复兴

王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美国南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的《大分流》中有一个著名观点，即18世纪以前世界上经济最繁荣的地方在中国江南。这引起我的一些思考，为什么是这样？从我研究的角度讲，可能有这几方面原因。

第一，移民的基因。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中，祖祖辈辈守在一块地上，但从唐到宋200年间，大量北方移民到了南方。到了江南的这批中原人所具有的勤奋、敢于去开拓的移民基因，是江南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因素。

第二，江南的水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水运文化。因为在所有运输当中，水运成本是最低的。中原文化说到经济上的交往，小毛驴拖100斤东西很了不起了，但是在江南，大运河连接南北，变成了一个运河的水网。很多古镇家家有小船，一条船运1000斤没问题，所以它的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了。和北方的小麦相比，南方的水稻有时候可以种两季，产量也更高，这样一来江南经济的底子就打下来了。

第三，世俗宗教。北方的移民来到了江南怎么安身立命？很重要的一点是“三教合一”的世俗宗教。道教解决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佛教解决了人的心安问题，怎么对待生老病死；儒教解决了人与人之间怎么和谐相处的问题。

第四，发达的手工业。江南的繁荣是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而农耕的特点是有农忙和农闲。作为“世界的瓷都”的景德镇并不是一年到头在做瓷器，4-6月份是在种地，第二年10月份以后才开始烧窑。这和英国的工业革命不同，他们城市里的人是每天上下班。在英国发达的是工业革命，流水线的工业；在中国发达的是手工业和手工业所支撑的商业。从某种角度讲，在中国文创产业古而有之，就是手工业。所以说，在大运河畅通的这段时间里，实际上中国有一场商业和手工业的革命，它的意义在世界上并不亚于工业革命。

第五，在大运河带来的商业和手工业革命中，同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比如，南北文化交流中戏剧的五方杂处，昆曲北上形成京戏，明清小说又推动了中国从文言文走向了白话文，这些都够得上文艺复兴、文艺创新的标准。它还带来了很多社会伦理上的创新，比如说中原文化的伦理是仁义礼智信，而到江南以后变成了信义仁智礼，因为经商的第一条准则是要诚信。此外，还有人的价值取向的变化，从“士、农、工、商”到“士、商、工、农”，因为经商者在江南的地位大大提高。这些变化难道不能称之为一种文艺复兴吗？

开放是江南地区文化的共性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会长）

江南文化的开放品格，植根于江南特定的资源禀赋，形成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彰显于两宋时期，顽强地呈现于近代，改革开放之后大放异彩。

谈到江南文化，我们会上溯到7000年前到4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说明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文明与中原的文明同样发达。但是，先秦、秦汉时期的江南在华夏文明的版图中一直属于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欠发达地区，属于华夏文化的边缘地带。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衣冠南渡”，北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南移后，江南地域文化对此没有抵制，而是主动融合，实现了第一次南北文化大融合，开启了东晋、南朝的文化繁荣。安史之乱以后，第二波北方人大批南下。靖康之难以后，第三波北方人大批南下。江南社会始终以积极、开放的态度来应对中原文化的扩散，实现一轮又一轮的文化融合。

江南文化的开放品格在两宋时期得到了鲜明的彰显。北宋跟南宋政权都偏安于中国东南，高度重视海上贸易，政府带头经营，民间积极参与，航路远拓、海船先进、贸易发达，造就了中国古代的航海盛世，充分滋润了江南的开放文化。朝廷在一些贸易港口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包括市舶司、市舶务或者市舶场之类。这些港口我们数一数有广州、泉州，有杭州、宁波、温州、华亭、江阴等等，大多数在江南。

鸦片战争以后，在众多开放的通商口岸中，发展之快、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总以上海为盛。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上海的开放传统。近代的上海人80%以上是江南人，上海的开放水平充分反映了江南文化的开放品格。江南人的开明还在于善于将危机化为商机。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30年代受世界经济广泛萧条的影响，上海的民族企业纷纷倒闭，但是有一个例外，即常州人刘国钧、刘靖基经营的大成纺织染公司，创造了中国民族纺织史上非凡的业绩。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间，江南作为我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对外开放取得了彪炳史册的成就。2019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这为整个江南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战略性支撑，也提供了更大的平台。

开放是江南的传统，是江南地区文化的共性。可以预期，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征途上，江南一定能取得新的更大辉煌。

江南城乡美学当从创新开始

张鸿雁（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江苏省城市现代化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

江南文化可以说是中国重要的文化根柢，某种意义上说，读懂了江南就读懂了中国。其真谛在哪里？在于“耕读人家”、“鱼米之乡”、“求新求变”、追求精致生活方式和生生不息的精神。特定文化地理环境和人文传统带动了这样的江南文化的发展。

一、江南文化是一种诗意栖居的文化模式。江南文化创造了典型的江南城市和乡村文化美学，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吴冠中曾说：“我这一生总是在陆陆续续地画江南”。在他的笔下，粉墙黛瓦，小桥流水，荷花翠庭、园林湖畔、亭台楼阁……景观符号构成了江南文化资本，她浓缩着政治和历史的变迁，并作为一种文化认同根植于中华文化主脉，呈现出人文魅力、美学素养和创新精神，它代表中国人对精致美好生活的极致向往。

二、江南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类型，“新海派江南文化”具有特殊的前沿性。江南文化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最显性的是，江南文化可分为“海派江南”、“苏派江南”、“徽派江南”、“浙派江南”和“赣派江南”等文化类型。在同一性中找不到不同，在不同中找到同一性，这才是江南文化研究的一种创新。“新海派江南文化”的定位，我认为既能找到上海自己的特色——国际化和全球城市定位，又能找到自己的传统——源于优秀江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三、“新海派江南文化”促进上海城乡美学创新。“东方美谷”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网链”和“产业簇群”，为“新海派江南文化”的城乡空间江南美学的重塑和创新创造了前提。奉贤可提出“新海派江南美学从奉贤开始”的发展思路，在美丽健康经济与文旅融合上开始一条新路，创造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综合节点城市”，创造一个全新的以美丽健康经济为主业的、以“新海派江南文化”为特色的世界旅游目的地。

以山水文化塑城市文明典范

陈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

江南的自然山水与艺术传统，深具江南文化特质，是中国精神的要素构成、审美表达和象征赋码，可为建设城市文明新典范带来魅力无限的创意空间。在新江南文化和新城建设中，江南山水文化的与时俱进与持续发力，是值得深入探索的空间。

第一，就区域范围而言，新江南文化不应以传统界定为限，而要从历史变动趋势和当代发展的角度，放宽至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整个区域。据此，奉贤有关新江南文化和以此为基底的新城建设，就具有为长三角区域城市文明整体进展先行探路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就地理要素而言，新江南文化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粉墙黛瓦、古镇书桥、平原水乡等基本特征，也应充分认识实际存在于江南区域的崇山峻岭、大江大川、浩瀚海洋。奉贤新城建设可于此间获得独到资源，既可为沿海城市探索基于海洋文明的新型建设路径，也可为区域内山区内陆城镇拓展出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新航路和大气开放的新格局。

第三，就文化形态而言，新江南文化既要传承体现生态禀赋的山水诗词、书画里的山水意趣、园林里的山水精构等已成经典的江南文化形态，更可拓展至自然、民间与现实生活的多重领域。在自然与人文、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艺术与生活、发展与环保的多重会通中，激发出新城文宠如春水般碧波荡漾的活化样态。

第四，就审美取向而言，新江南文化可在清雅精致、细腻婉约等传统审美基础上，从层峦叠嶂的连绵不尽、万年蛇立的永恒不休、静默不语的坚韧包容中，感受峻拔、坚毅等审美形象，推崇壮美、崇高美等审美范畴，拓展出庄严神圣的美学境界，丰富城市审美内涵。

第五，就精神特质而言，新江南文化要走出以往农耕文明的恋地情结、精英文化的士夫闲趣、传统意味的杏花春雨，着力揭示蕴含于山海深处、民间生活中本真、清澈、豪迈、血性等更具生命力、更有力量感的优秀元素，塑造静穆沉雄、虚怀磊落、厚德载物、大美深阳的新时代山水精神，涵养高远格局，塑造新城之魂。

衷心期待新江南文化和新城建设传承江南优质山水文化传统，融会历史、地理、环境、精神多重元素，建成具有江南人文特质、中国文化基因、东方文明神韵和绿色生态优势的新型山水城市，为走在国际化大都市道路上的上海，注入来自自然生机和中华山水文化的底色、灵性、智慧和活力，创造城市文明新典范。

新城发展人文培根人文先行

杨志刚（上海博物馆原馆长）

我想从文博考古的角度和大家分享在新江南文化和新城建设的这一些体会。在“博物馆十大热搜展览”中，上海占据三席。排行榜前五有三个是上海的博物馆，排在第二就是奉贤的。那么，这样火热的展览带来了什么？带来了人流、人气，也可能拉动消费。博物馆的活动有助于人们开展社交、疗愈情绪。还有助于文化传统的学习教育。但理解这个现象仅仅留在这些层面是不够的，需要回到人文这个概念。

讲到人文，它的含义可能很杂、很广，我想强调的是人文的地貌。地貌以前一般讲的都是地理环境，地理条件下的一种景观，但我觉得这几年奉贤博物馆在艺术文化方面的作为和表现形成了一种新的人文地貌。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或许能够把握住这个时代变化发展一些深层的东西。无论是地区还是国家，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一定不能丢失人文关怀。五个新城的建设在注重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各维度提出的同时，如果能正视人文振兴的重要性进社会的引领先机，成为领跑者，这里包括传承、发展、创新。

来到奉贤，我就会想起那句“陆止于此，海始于斯”的名言，这是奉贤得天独厚的地方，也是奉贤在新城建设或者在新江南文化建设方面潜在的优势。在奉贤的历史记忆中，其实和海是分不开的。奉贤通江达海，文献上说“历史上海滨广斥，盐田相望，属煮海衣耕之地”。现在华亭海塘奉贤段已经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奉贤这个“交汇之地”，我觉得不单单是海陆交汇。近年来奉贤办的几个展览其实就是一种交汇，去年和四川合作办了三星堆文物展，今年和陕西合作办了周秦汉唐文物展。最近的“与天无极”展览将陕西省一些顶级博物馆最宝贵的馆藏重器请到了奉贤。不仅仅是奉贤，上海市区有很多朋友也特意来到奉贤，这就是新城建设人文先行的效应。引进、相互激发、相互交流、互相交汇、融合影响的磁铁作用。

在新城的建设过程中，文化机构必须关注社会的发展并为其赋能。海陆交汇既是我们的地理特点，也已经成为上海的文化品格。它在近现代历史上到今天能够有这样的地位和文化品格是分不开的，这对于我们形塑新江南文化是至为重要的。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日前，第一届“新江南文化与新城建设”高峰论坛在奉贤举行。金海湖畔，群贤毕至，长三角知名文化学者聚焦新江南文化之“传承与创新”，把脉新江南文化品牌塑造。“贤者地”奉贤，再次彰显打造新江南文化引领地的文化自信与自觉、雄心与方略。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努力回答好“奉贤之问”和“新城新在哪里”的实践命题，新江南文化是切入点和突破口。

江南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研究表明，明清江南之所以引起普遍的关注，始终是与中国发展的前途与希望何在这样一个“大关怀”联系着的。君不闻，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传诵至今；君不闻，17、18世纪“中国热”席卷欧洲，作为东方美学代表的江南园林、绘画、手工艺，成为欧洲人追捧的时尚……穿越历史烟云，江南文化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也唤起了无数人对中华文化的崇敬。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新江南文化“新”在何处？新在以红色文化为魂，让“江南”意识从历史意识走向现代意识，从文化传承走向服务国家战略；新在向前看、向未来，为建设“最江南”的五个新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探索新路径；新在把江南文化中开放包容、敦为人先、尚德务实、崇文重教的精神内核转化为支撑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力量。

今日之江南，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文化版图中最具创新活力的区域之一。“少年奉贤”正向“青春奉贤”缓变。打造新江南文化的城乡空间策源地、生活生产弄潮地、生态肌理重塑地、精品力作打卡地、文化创新魅力区，“奉贤版”的新江南文化映射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它意味着，新江南文化不仅有《富春山居图》的诗意，更有“数字江海”的新江南城市意象；不仅有《清明上河图》的繁华，更有共同富裕的城市发展愿景……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不断丰富新江南文化的时代内涵，这是一篇“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的时代大戏，这是一种充满文化自信的实践创新。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新江南文化”必将在我们追梦的征途上绽放绚丽之花！

▼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

◀乡村振兴三园（总部）

齐聚贤者地 共话“新江南”

——第一届“新江南文化与新城建设”高峰论坛五大平行论坛在奉贤举行

【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的乡村振兴】

以新江南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以田园生态为底色，瞄准“奉贤是个大公园、村村都像度假村”的目标，奉贤走出了一条国际大都市背景下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黎雨力指出，乡村是城市的母体、城市是乡村的延伸和延续，只有懂得乡村，才能振兴乡村。上海已初步形成大都市乡村振兴模式，但仍存在乡村产业同质化、乡村资源要素流通不畅、土地资源价值提升受限等问题。他认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坚持规划引领，强化要素保障，不策划、不规划，不规划、不设计；要从“三农”实际出发，以“三园”工程为抓手破解瓶颈难题，让乡村美起来、强起来、活起来；要大力推动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大力发展绿色农业、规模农业、科技农业、品牌农业。

奉贤区委副书记骆大进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奉贤实践”的主旨演讲中说，奉贤区始终以新发展理念统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把“繁荣发展大农村”作为重大任务，加快建设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三大工程”，切实走好三条发展之路。第一条是创新发展之路，通过制度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凸显乡村经济价值。第二条是绿色发展之路，通过打造绿色田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示范”水平，凸显乡村生态价值。第三条是融合发展之路，通过促进功能融合、文化融合，彰显跨界之美、文明之美，凸显乡村美学价值。

四川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姜晓萍提出，乡村振兴，关键在于解决乡愁为何不愁、乡村谁来振兴两大问题。她提出，建设“人民至上”的乡村美好生活服务体系，要秉持“三共融三治”的乡村基层治理原则，用“集成创新”的战略思路，遵循“统筹推进”的实现途径，构建“碧山见水”的乡村生态体系、“授权赋能”的乡村人才振兴体系、“持续发展”的乡村治理创新扩散体系，来引领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的变革。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熊万胜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抢抓“前期郊区化”向“深度郊区化”的重要转折时期，找到城市与乡村的最佳结合点，推动城乡深度市场化融合，进一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张乐天说，要特别关注“人的转型”，尤其要重视农民在新形势下正经历的转变，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积极传承、激活中华传统文化，让农民的主体性、传统的转化性在实践中发光发热，创造更多地方特色，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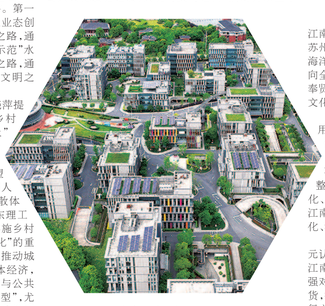
【“慈善孝贤”五地论坛】

以“家文化”建设助推基层社会治理

奉贤多年来一直维持着家风建设的传统，滋养了当地的“家文化”。从2015年开始，慈溪、嘉善、孝感、上虞、奉贤五地建立文化研究合作机制，轮流举办研讨交流活动。此次高峰论坛五地现场签署了新一轮“慈善孝贤”文化研究合作框架协议。

奉贤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向义海介绍，奉贤区在源远流长的“贤文化”基础上，结合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东方美谷产业发展的实际，启动“贤美文化”建设。他认为“家文化”是“贤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贤美文化”在家庭层面的必然要求和集中表现。奉贤区通过“圆梦行动”“好家训好家风培育”“东方美谷艺术节”等工作抓手和最美家庭、道德模范、新时代好少年、世贤学子、贤城好家长等系列评选活动，推进“贤美文化”的践行。依托“贤美文化”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实现以文化人、以文润城、以文兴业，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实现可及可达，在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基础上，组建名家领衔的九棵树艺术家委员会、九棵树爱乐乐团等团队，满足高雅文化需求。

▲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



▲东方美谷核心区

浙江省慈溪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江再国以“弘扬慈风孝行新风尚激发基层治理新动能”为题作主旨演讲，表示“慈文化”建设已经写入慈溪市“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未来将聚焦实践养成、服务民生等重点，形成“行政推动、社会联动、群众互动”一体化格局。

湖北省孝感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莉说，近年来，“孝文化”的大力推行有效地实现乡村人文环境的改善与升华，从而推动孝感市美丽乡村建设走向更高水平，并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思想感染、理念说服以及改变教育的独特优势。

浙江省嘉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明办主任江继铭表示，嘉善县以“善文化”培育为引领，实现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升级换代。下一步，嘉善县将进一步挖掘“善文化”内涵外延，通过开展高端论坛、文化走亲、思想研讨等活动，深化“善文化”基础理论研究。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沈可指出，多代同堂家庭不仅是族义的“同住一个屋檐下”，“一碗汤距离”的两代人仍能保持高密度的互动与情感联结，同时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并弥合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距。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瑛认为，家在中国文明中具有特殊地位，是中国社会治理绕不开的枢纽。社会治理不能只是将家庭当做外在于家的功利性目标的实现工具，而应在尊重现代人的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围绕家庭主体性和家庭价值的培育和激活，设计社会政策，推动家庭价值的守护与再造。

【新江南文化与城市软实力】

在文化认同上构建更大的同心圆

软实力是实力之基。奉贤通过把新江南文化融入新城建设中，着力营造一座人性化、人文化、人情味的人民城市。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徐锦江认为，从江南的上海最后变成了上海的江南，过去上海人称“小苏州”，后来苏州变成了“小上海”；从江河文化发展到海洋文化，从传统文明发展到现代文明，从中国视野转向全球视野，江南文化首先在上海发生了海派新文。奉贤提出“新江南文化”，在上海的周边区域还有江南文化的自然资源，包括人文资源可以打造。

奉贤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包薇英提出，要充分利用奉贤历史文化人物事件以及附着在这些人物事件之上的作品、情怀、气节，为区域的文艺创作文化繁荣提供素材；要充分利用奉贤历史文化人物事件中独树一帜的历史文化符号、元素，融入城市整体形象设计，串点成线扩大宣传；要聚焦江南文化、水岸经济，结合古镇复兴等，重点打造冷江雨巷等江南水乡风貌，充分传承、融合创新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建构奉贤的新江南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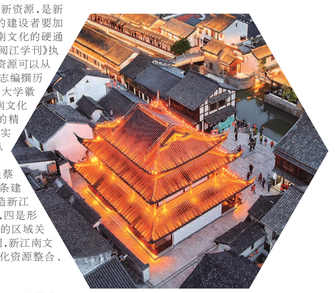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江南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田兆元认为，创新的言子文化是奉贤文化创新资源，是新江南文化的软实力资源。新江南文化的建设者要加强对《礼运》，对言子祠的研究，奉贤文化的硬通货，把崇尚贤德与江南文化无缝对接。《阅江学刊》执行主编渠红岩认为，挖掘奉贤历史文化资源可以从地方志入手，因为江南是我们全国地方志编撰历史最悠久、质量最高的地区之一。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沈昕认为，新江南文化以长三角文化为依托，涵盖各区文化的精髓，最大限度整合文化的差异，增强城市实践参与主体的心理认同和横亘归属，从而提升城市的凝聚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蔡丰明就新江南文化的实践路径提出五条建议，一是打造新江南文化精神，二是打造新江南生态环境，三是建立新江南文化业态，四是形成新江南的产业布局，五是构建新江南的区域关系。江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余红艳强调，新江南文化的构建一定是整体的，尤其要加强文化资源整合、行业条线整合及学术文化研究整合。

【从江南城市建设阅读江南文化意蕴】

以文化地标展现新江南水乡风韵

江南文化底蕴离不开建筑的符号化表达。新江南首先是可视的，其次是体验的。奉贤特色建筑的背后展现了新江南水乡风韵。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任小文提出，江南文化是丰富多样的江南地域文化的总和，同样的文化元素有着多样的文化表达，也受到不同地域的文化影响而不断形成新的文化形态。从国家战略视角看，江南文化的时代价值涵养出旺盛的生命力；从大文化视角来看，江南城市是江南文化的外化、活化和创化，是“五个新城”建设的新的城市文化形态。因此，江南文化与城市建设的相互赋能，必将催生新的城市形态、新的城市地标、新的城市生活。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宇越敏指出，建筑风貌只是文化要素的一部分。他从江南水乡和江南园林两个方面例举了大量案例，强调江南文化的景观塑造要尊重自己传统的文化。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副研究员王晓静认为，要重新认识江南乡村的文化传承价值，开发更多形式的创造创新方法，以崭新的表现方式参与到城市人文空间的建设中。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郑崇选认为，奉贤创新提出“新江南文化”理念，正是上海在打造文化城市地标和打响区域文化品牌的指引下，作出的挖掘和赋能。同济大学资深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文化传播中心首席专家王国伟提出“新江南”空间实践的三个基本维度。第一是保护、激活和还原历史资源。第二是延展。第三是创新。此外，要强化空间消费力建设，打通教育、传播和消费，发挥空间媒介的强传播力，重视场景建构。上海交通大学设计研究公院城乡创新设计研究院院长孙洪刚从设计师角度阐释了江南文化的三个特点，即引领性、和谐性、浪漫性，并认为这是城乡设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刘士林认为，从历史看，中国的新城发展当前正处于文化引领城市发展的建设阶段。在此过程中，必须要重视保护城市的历史和文脉。



▲青溪老街

【走进奉贤探寻江南史前文明演进】

加强重要文物点的保护、展示和利用

奉贤古以三岗成陆，现已发现的柘林古文化遗址、江海古文化遗址证明，奉贤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提出，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文明在距今5300年前就已经完成了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长三角区域文明的最大价值体现在它的整体性中。他认为，百年考古是新一轮的起点，长三角地区史前考古所发现的重要文化遗产应该加强共遗产价值的整体表述，加强重要文物点的保护、展示和利用。这是长三角地区最古老、最核心的，对当今和未来有长久影响的文化基因。

奉贤区政协副主席邵惠娟认为，当下要古今辉映，赋能新城建设，需要对古镇、古村、古建筑的利用和再创造。经初步统计：奉贤历史上存在过的古镇有57个，古村落500余个，古建筑（列为文物的）104处。如何活化发展“三古”？首先要以人为本，活化发展的关键是融入生活。其次，要物文并重，留住“形”还要留住“神”。最后，要坚持“保护开发并重、政府投入和社会融资并举”原则，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对“三古”保护开发。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指出，史前江南的文化谱系中，以良渚文化的对外辐射能力与影响力为甚。在文化输出的同时，江南区域也广泛吸纳来自不同地区的文化因素，对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江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良渚遗址的发掘者之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指出，良渚是最初的江南。良渚文化的特殊面貌之所以能够形成，关键词是稻作、水乡和堆坎，这是一种江南模式。

柘林是长三角东端最古老的陆地，是古上海发祥地之一。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主任黄翔、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院教授王张华、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熊建雪博士分别介绍柘林遗址的考古新成果。柘林镇党委书记项华提出，要注重古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特色文旅小镇建设的有机结合，着力打造三张柘林城市名片，即：海国长城、柘林滚灯、柘林古街。